

目 录

1	第一章 引 言
15	第二章 汉语的音步类型及三音节音步的韵律特征
16	第一节 汉语的音步类型
33	第二节 三音节音步的韵律特征
41	第三章 三音节音步的韵律构词形态
45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
48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
59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105	第四章 三音节音步的句法形态功能
112	第一节 三音节动词能否重叠
117	第二节 特定句法结构中的三音节音步及其句法形态
141	第五章 三音节音步的历史来源及其文体属性
142	第一节 古今韵律的不同
153	第二节 三音节音步的历史起源
156	第三节 三音节音步的文体属性
169	第六章 三音节音步的轻重音及其语体属性
171	第一节 三音节音步的轻重音

181	第二节 三音节重叠式的轻重模式及其韵律形态
189	第三节 三音节音步的语体属性
195	第七章 结 语
201	参考文献
213	后 记

1

第一章

引 言

本书重点关注现代汉语三音节的韵律问题，那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汉语的韵律问题。汉语的韵律问题发现于何时，或者说汉语的韵律研究究竟始于何时，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这些都是必须交代清楚的。我们这里首先借用冯胜利、王丽娟（2013）的总结：

章太炎《国故论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郭绍虞《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等早已论及。之后陆宗达和俞敏（1954）、吕叔湘（1963）、张国宪（1989）、启功（1991）等开始从语言学角度讨论汉语韵律与语法的关系问题。然而汉语韵律构词学的确立和研究却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情。王洪君（1996、2001、2004）、陆丙甫（1989）、Duanmu（1997、1999、2004）、端木三（1997、1999、2000）、吴为善（2003a、2003b、2005）、Lu 和 Duanmu（2002）等都做过大量的工作；从 1996 年、1997 年开始，冯胜利进一步把韵律对词法的制约当作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层面提出并加以专门、系统的研究。该研究首次将节律音系学中“韵律词”的概念引入汉语研究，系统提出了标准音步（双音节）、蜕化音步（单音节）与超音步（三音节）之间的区别及其在韵律构词中的作用。

看了这段总结大致了解了上面提出的基本问题，但是细节还不能完全把握，尤其是较早时期的相关研究。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首先介绍较早时期的相关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汉语韵律问题的脉络。说起汉语早期的韵律研究，不得不提到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是郭绍虞先生，一位是吕叔湘先生。诚如潘文国先生在他的《汉语构词法研究》(2004)一文中所谈到的：“真正认识到这一（韵律）问题重要性的只有30年代的郭绍虞和60年代的吕叔湘。现在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时隔30多年之后，终于又有了90年代的韵律语法研究。”时隔四年，他在叶军的《现代汉语节奏研究》的序中，又一次强调了韵律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语言组织问题只跟语法有关，语法学好了，写文章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一旦解决不了，就不得不回到被自己否定的老路上去。现代学者中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我曾经提到过有三个人，这就是30年代的郭绍虞、60年代的吕叔湘和90年代的冯胜利。郭绍虞写于30年代的《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等系列文章，开创了从节律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前河，1979年他更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看法：“汉语对于音节，看得比意义更重一些。”但郭绍虞的意见长期受到忽视，或至多被看作是一种“修辞”研究。直到60年代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发表，由于其本人的崇高威望，才使语法学界意识到音节问题不仅仅是个修辞问题，而且是个语法问题，同时吕叔湘先生还把音韵语法的结合研究从词汇层面提高到句

法层面。90年代，冯胜利结合西方韵律学的研究，提出了汉语韵律句法学，把两位前辈开创的研究，在理论化、体系化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且与西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相结合，使这一研究更具有了国际色彩。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郭绍虞和吕叔湘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郭绍虞先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他1938年发表的《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一文中，这篇文章对于后来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他首先注意到了汉语单双音节的问题。他分别从“语词伸缩例”“语词分合例”“语词变化例”和“语词颠倒例”等四个方面说明了中国语词的弹性。认为此四例对于音节的配合极为方便，所以在骈文律诗中，此种现象（弹性作用）尤为明显。而中国旧文学的修辞技巧，以选择语词为重要的条件。“选辞得当，可以求其匀整，可以求其俪对，更可以求其音调之谐和，随心所欲，无施不可；有时可使为谐隐，有时可使为回文，更有时可以运用古典。”他更进一步认为，即使说中国文辞上所有的种种技巧都是语言文字本身所特有的弹性作用，也未尝不可。

那么究竟何为郭绍虞先生说的语词的弹性作用呢？此种弹性作用的成因又为何呢？郭绍虞（1938）中提出：

我尝细究中国许多语词，很难肯定地说某一语词为单音或复音。我觉得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初无一定，这即是我们所谓弹性作用。此种弹性作用之所由形成，其最重要的原因，恐即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协调。由中国语言的

演化言，逐渐倾向于增加连缀的词类；由中国文字的应用言，似乎依旧保存着单音的特质——此种情形在文言方面尤为显著。这即是目治与耳治二种作用不同的关系。耳治的，所重是语词意义在声音上的辨析，所以要利用复音语词；目治的便没有这种需要。所有尽有语言中的复音语词，待写入文辞却可以易为单音；也有本是单音语词，而在语言中必须强为凑合使成为复音。这种现象便造成了语词的流动性。例如“衣”“椅”同音，语言中必须有“衣服”“椅子”之分，而写入文辞，即不妨单用一个“衣”或“椅”字。这在同音而不同声的语词，犹且如此，何况同音而兼同声的呢？

由此可知，郭绍虞先生认为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主要是语言文字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目治”和“耳治”作用不同的产物。因而写入文辞时则可用单音，语言中则用复音。这样的解释，其实主要讨论的是文字对于语言的影响，而没有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为什么语言中同时有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存在，也没有对语言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加以区分（只是指出“目治”和“耳治”有所不同），更没有解释为何古汉语多为单音词而到汉代之后逐步产生了大量双音节词的历史现象。但在当时能认识到汉语词汇单双音节的问题，这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他认为正是因为语言文字不协调，所以虽有后起之复音语词，却又保存着原始的单音语词。意义无别，而语词之单复有分，于是在修辞上，尤其在音节方面，便有选择的需要。也正因如此，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格外显著。那

么为什么郭绍虞先生认为语词的弹性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格外显著呢？其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何以语词之弹性作用格外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着呢？即因为文人之修辞技巧，正能利用这种不调协性而使之调协。利用文字之单音，遂成为文辞上单音步的音节；利用语词之复音，遂又成为文辞上二音步的音节。单复相合，短长相配，于是文章掷地可作金石声了。然而实际上，这依旧与复音语词的本身有关系。盖中国之复音语词，与他族语言之复音语词不同。中国之复音语词，也以受方方的字形之牵掣，只成为两个单纯化的声音之结合。其孳化的基础，依旧是建筑在单音上的。由这一点言，即谓为单音化的复音语词也未尝不可。所以复音语词以二字连缀者为最多，其次则三字、四字。二字连缀者成为二音步，三字连缀者成一个单音步、一个二音步，四字连缀者则成为两个二音步。中国文学之得有一种特殊的韵律者，即因语词的音缀适合这种配合条件的缘故。利用单音语词演化为复音的倾向，利用复音语词之单音化的特质，于是语言文字之不协调性遂归于协调，而文学作品中遂很显著地表现着语词之弹性作用了。

由上可知，郭先生所谓语词的弹性作用指的是语义基本一致的情况，有对应的单音节形式，也有双音节形式，比如“家/家庭”“扫/打扫”。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弹性，他认为主要在于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匹配。就语言的发展而言，逐步倾向于增加连

缀。就文字的发展而言，文字依然是单音节文字。他所指的语词的弹性作用，不是从“双音化”的角度来解释的，而是认为语言中单复形式同时存在，而语义无别，因此作文修辞上便有音节选择的需要。即其重点不是解释“双音化”是如何完成的，而是说明单音、复音都存在的情况下，文学作品如何利用这种语词的弹性作用来达到一种修辞的效果。

正如我们上面所言，郭绍虞先生的解释，没有触及核心的“双音化”问题，只是探讨了单双音节都存在时，如何根据修辞来选择的问题。学界对“双音化”的解释，诚如冯胜利（2006）指出的：“双音化的诸多意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古而然说（郭绍虞，1938）；另一类是后来发展说（王力，1980）。”而后来发展说又有“对称说”“单音节信息量不足”等说法。这些说法我们认为都无法从根源上解释“双音化”，我们比较赞成的是冯胜利先生（2006）从韵律的角度对“双音化”进行的分析，认为汉语的双音化来源于汉语的双音步，而双音步当源于上古汉语的音节简化和声调的出现。音节简化使单韵素音步无法成立；声调的实现又抵消了音节的长短之分，双音节音步因此而生。

郭绍虞先生之后，直到吕叔湘（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音节单双问题才又引起重视。吕叔湘先生开篇就指出：

本文的企图只是把单双音节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似乎是个性质颇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有语法问题，也有语汇问题、修辞问题。

吕叔湘先生也指出郭绍虞先生讲的都是古汉语的情况，主

要说明语词的伸缩是汉语修辞的特点。而他讲的是现代汉语的情况，觉得里面有修辞问题，也有语法问题。比如可以说“打扫街道”，也可以说“扫街”，什么时候用哪个形式，这是修辞问题。又比如可以说“签名、签个名、签了名、名还没签”等，而单说的时候必得说“名字”，这就成了语法的问题。将音节的单双与语法联系起来，讨论音节单双对语法造成的影响，这就从郭绍虞先生的音节单双主要作为文学修辞的手段中解放出来，开始了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开创了从节律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先河。

那么吕叔湘先生是如何切入这一研究的呢，他主要从“单音节的活动受限制”“双音化的倾向”“从双音节到四音节”“与某些虚字有关的音节问题”等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证。下面我们分别来看这四个方面的情况。

他首先介绍的是单音节的活动受限制，在这一部分，他主要从人名、地名、山名、国名和数目字等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人名，比如他提出单姓和复姓的区别。当别人问“你姓什么？”，单姓多半要回答“姓张”或“我姓张”，而不太能说“张”，而复姓就可直接说“欧阳”。再比如地名。他认为县名有两个字的可以不带“县”字，一个字的必得带“县”字。所以常常是“大兴、通县、顺义等县”^①，虽然末了有“县”字，但通县的“县”不能省。国名也是如此，英国、法国，单说非带“国”字不可。印度、哥伦比亚，难得听见带“国”字。由吕叔湘先生的这些例

① 今称“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

子我们可知，汉语中单音节的使用确实存在很多限制，不如双音节使用灵活。而单音节的使用之所以受限制，如果用韵律构词学来回答就是，单音节是蜕化音步，不是标准音步。因此使用起来就有一定的条件，要么是组成双音节的标准音步，要么是通过声音的延长，总之不是很自由的音节。

上文既然介绍了单音节的活动受限制，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双音化的倾向。他指出在现代汉语的语句里，双音节是占优势的基本语音段落。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把超过两个音节的减缩为双音节，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

这部分吕叔湘先生主要谈的是双音化的两种方式：或者在前面 / 后面加上一个不增加多少意义的字，或者把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合起来用。前者如“老虎、老鼠、老鹰、老雕、老鸹、老鸦”“念头、想头、苦头、甜头”等。后者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两字同义，造成的词仍然是这个意义，只是双音化了。如“身体”，“身”就是“体”，“体”就是“身”，“身体”还是这个意思。同样的例子如“皮肤、牙齿、背脊、年龄、衣服、树木、房屋、田地、墙壁、状况、姿态”等。另外一种是以一个字为主体，连上一个意义相近或有关的字做陪衬。例如“眼睛、肩膀、窗户、书籍、报纸、灯火、云彩、雾气、国家、事情、位置”等，双音化的用意尤其明显。

第三部分是从双音节到四音节，这部分主要谈到了三音节和四音节的问题。他认为三音节的语音段落，大多数是由一个双音节加一个单音节（2+1）或是一个单音节加一个双音节（1+2）

构成的。从结构关系上看，除少数情况外，都属于偏正或动宾两类。认为偏正组合可以按能否在中间加 **de**^① 字分成松、紧两种。较松的即能加 **de** 字的，不能加 **de** 字的组合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构词方式。其中 2+1 式（如“动物学、示意图、辩证法、可见度”）比 1+2 式（如“副作用、手风琴”）要多得多。他认为这跟在前或在后的单字的性质和可以这样用的单字的数量有关系。三音节的动宾组合差不多都是可以拆开的，比如可以在动词后面加“了”字，可以在中间加数量词。跟偏正组合的情形相反，三音节的动宾组合是 1+2 式（如“买东西、写文章”）多于 2+1 式（如“吓唬人、糟蹋钱”）。他认为这跟常用动词中单音的较多有关系，可是否完全取决于这个因素，他认为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一研究使我萌发了研究三音节韵律构词形态的想法，之后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三音节内部的 1+2 以及 2+1 的动宾或偏正组合展开的。当然，为什么偏正组合 2+1 多，动宾组合 1+2 多，这在后期不同的理论中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首先关注这一问题的还是吕叔湘先生，这也是我们对吕叔湘先生这篇文章进行重点介绍的原因。

关于四音节，他指出 2+2 的四音节也是现代汉语里的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四音节的倾向表现在某些组合里是一个双音节成分要求另一个成分也是双音节。文章共列举了五类四音节的情况。第一类是“进行、加以、予以”以及某些双音副词的后面

① **de**，这里沿用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的写法。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语助词要数 **de**，这个词的用处很多，主要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和“地”，具体可参考吕叔湘《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一文。

要求搭配双音动词。例如“进行调查、加以整顿、互相埋怨、共同使用”，不说“*进行查、*加以整、*互相怨、*共同用”。第二类是很多双音动词要求后面的名词宾语至少有两个音节。例如“调查事实、了解情况、发生作用、操纵机器、管理图书、开垦土地”，不能说“*管理书、*开垦地”等。第三类是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组合（整个组合是名词性的）同样要求名词至少是双音节。例如“钢铁生产、余粮收购、货物运输、地质勘探、音乐欣赏”，不能说“*钢生产、*粮收购、*货运输”。第四类是某些双音形容词只出现在双音名词之前。例如“伟大人物、辉煌成绩、宝贵意见、先进经验、强大队伍、严重后果”，这类形容词有的也可以用在单音名词前，可是必得在中间加个 de 字，例如“伟大的人、宝贵的书”。有的加了 de 也还是要求双音名词，例如不能说“*辉煌的城、*强大的国”。第五类是两个同类并且意义相近的双音词常常联合起来造成一个短语。例如“文化教育、财政经济、风俗习惯、强迫命令”。吕叔湘先生上面举出的 2+2 的五类情况，冯胜利先生将之发扬光大，编写了《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并将这类词命名为“合偶词”。

第四部分，吕先生谈到的是与某些虚字有关的音节问题。这部分主要谈了几类虚字：“不”“和、与、或”“de”“得、不”，重复动词中间的“一、了、不”，以及“给、在、向”等，这里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以上我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材料，因为历经几十年之后，吕叔湘先生提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备受关注，例如形名结构中 de 的隐现问题。吕叔湘先生 1963 年撰写的

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除了单双音节的问题，还涉及双音化、四字格、缩略语、现代汉语的节奏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现象并没有很快引起学界的重视，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国内韵律构词学、韵律句法学的兴起才又引起重视。当时活跃在韵律研究方面的学者，国内如王洪君、吴为善、陆丙甫，国外汉学者如陈渊泉、冯胜利、端木三、王志洁等，都针对汉语中的韵律现象做了很多探索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汉语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现代汉语的三音节韵律问题，如吴为善（1986、1989）、张国宪（1989）等。此后三音节韵律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相关理论也应运而生。而这当中三音节结构内部的单双音节组合受到的关注尤其多，除了吕叔湘先生观察到的动宾组合以及偏正组合以外，还扩展到了动补组合以及主谓组合，一时之间，各种解释风起云涌，形成一片活跃之态。

以上研究在本书中都将归纳为三音节音步的韵律构词形态功能，这一部分将在第三章有更为详尽的介绍。学界关注的三音节音步，除了韵律构词形态之外，还有三音节音步的一般韵律特征，如被迫性、反向性、伸缩性等，以及三音节音步的句法形态功能。汉语的韵律形态研究近几年刚起步，目前主要研究汉语音节长度及汉语重音的形态功能。对于三音节音步来说，主要包括三音节音步的韵律构词形态功能，如“左向造语，右向构词”，以及三音节音步的韵律句法形态功能，如“*收徒弟山神庙、*关严实窗户、*简单化问题”等的不合法。三音节音步的韵律

形态功能研究将以往的零散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三音节的韵律功能。除此之外，三音节音步的历史来源及其文体属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跟近年来韵律文体学的兴起有很大关系。韵律文体学将语言学与文体学结合起来，从语言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文体的演变，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我们的研究将主要介绍以上几个方面的成果，希望能为汉语韵律初学者提供一些帮助。

思考与练习

1. 谈谈你对郭绍虞先生提出的语词弹性作用的认识，你认为产生语词弹性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吕叔湘先生谈到汉语中的四音节现象时指出，某些双音形容词只出现在双音名词之前。例如“伟大人物、辉煌成绩、宝贵意见、先进经验、强大队伍、严重后果”，这类形容词，有的也可以用在单音名词前，可是必得在中间加个 de 字，例如“伟大的人、宝贵的书”。有的加了 de 也还是要求双音名词，例如不能说“*辉煌的城、*强大的国”。你能结合例子尝试分析这些形容词有哪些，它们为什么有以上音节搭配的要求吗？